

诗意地栖居在陇原大地上

——甘肃当代诗歌的地域书写及诗学建构研究

周文艳

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

【摘要】：甘肃当代诗歌扎根西陲陇原，承边塞诗文脉、聚多民族文气，已积攒起丰厚的创作实绩，成为诗歌高地。然而，因地理位置的偏西，甘肃诗歌总免不了被笼统归类，贴上西部题材的标签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诗学建构，创作繁盛，而理论荒芜。因而，突破表面化的地域风貌解读，深究甘肃诗歌地域性的本源、地域书写的肌理、乡土经验的诗学建构和审美体系的形成，勘定其在当代诗坛的真正价值，就显得尤为重要。以此，或可打破学界对甘肃诗歌的偏见，为当代诗歌的地域书写跳出题材牢笼，确立自身诗学，出份薄力，或亦可为当代地域文学和多民族文学研究，添砖加瓦。

【关键词】：甘肃当代诗歌；地域书写；诗学建构；空间诗学

DOI:10.12417/3041-0630.26.06.053

诗歌是人类最古老、最纯粹的艺术形式。甘肃，既是诗歌大省，也是西部诗歌高地，更是中国诗歌地域传统的精神原乡。河西走廊，这个充满诗性的想象空间，在甘肃诗歌中以多重意象被构建出来。从汉唐边塞诗余韵，到当代多民族共生的吟咏，陇原诗歌，有着独一份的厚重和力量，体现出“天人合一”哲学传统的现代诠释，也构筑起中国西部诗歌特有的审美范式。然而，在理论建构层面，却一片荒芜。要避免甘肃诗歌被持续标签化、扁平化，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权，缺乏独立的诗学身份，就要对甘肃诗歌的地域书进行诗学建构，撕掉浅层的地域符号的枷锁，从被归类的题材写作，走向诗学自立。

1 甘肃诗歌的地域性从何而来

地域与文学，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。作家从一片土地上生长起来，当地的历史、文化、民俗风情等，必然会像血液一样，融入他的生命，成为他创作的源泉，并形成其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文学创作的永恒母题。

地理因素是甘肃当代诗歌地域书写的底色。甘肃西壤新疆、青海，北扼宁夏、内蒙古，东通陕西，南接蜀地，横跨黄土高原、青藏高原与河西走廊。河西走廊纵横东西，串联起戈壁荒滩、无垠草原、雄奇山川与千古关隘，黄河穿境而过，祁连山绵延千里。地貌之杂、之阔、之苍凉，在国内外都属少见。这样的自然风貌，是诗人日日身处、朝夕相对的生存场域，风沙的凛冽、土地的厚重、山河的辽阔，早已渗入诗人的骨血，化作诗意的苍凉与开阔。

丰富的早期人类文明与悠久的历史文脉，成为甘肃千年文

脉的精神积淀。甘肃不仅地形复杂，地貌丰富，更是早期人类文明的重要舞台。旧石器时代的大地湾、马家窑、齐家、姬家川、寺洼、卡约、沙井等文化遗存，散落于陇东、陇中及河西等地；伏羲、女娲、西王母、黄帝、大禹等华夏始祖的神秘传说，亦深植于陇原人民的血脉之中。甘肃历史文化浩荡绵长，庆阳的周人先祖、秦州的秦王战车、敦煌莫高窟的飞天壁画、汉代遗存至今的山丹军马场、秦、汉、明三代蜿蜒而立的古长城，都令无数诗人为之倾怀。同时，又有儒释道及多民族等多元文化的吸收和交融，千百年来，这些文脉传承，早已从尘封在书本里的死的文字，渗透进这片土地，流进诗人的血脉，成为活的精神。《中国文学史》中，袁行霈道：“唐代边塞诗以河西、塞上为核心书写空间，构筑起华夏边塞诗的经典意象体系与精神脉络，后世西北地域的边塞吟咏，皆循此脉而作，承其风骨、拓其意境。”^[1]甘肃诗歌的文脉根基，正是对这一诗学传统最好的继承与延续。

多民族共生的生活经验和文化属性，也让甘肃诗歌富有了民族书写的特色。

在甘肃，汉、藏、蒙、裕固、东乡等各族人民世代相守、毗邻而居，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相融相生，经丝路传入的异域风情与本土民俗共生共荣。迥异的生存方式，不同的情感表达，多元的精神信仰，汇成更复杂、更真切的生存体验。这类多元文化的滋养，让甘肃诗歌的地域书写有了更多的开放性，既有本土底色，又兼容并包，字里行间的人间况味，相较单一文化语境下的写作，显得更为深沉和动人。

甘肃当代诗歌的地域书写，并非静态、浅层的地域再现，

作者简介：周文艳（1994-），女，甘肃泾川人。文学博士，甘肃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，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与批评。青年作家，诗人，中国文艺理论家协会，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、作家协会会员。已在《文艺理论与批评》《阿来研究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》《文学自由谈》《兰州文理学院学报》《甘肃高师学报》《边疆文学》《绿风》《甘肃日报》等刊物发表文艺评论、诗歌、散文多篇。

更伴随社会和时代语境的变迁,诗学观念的嬗变,是一个动态的空间生产的过程。较早的闻捷、李季、杨文林等诗人,以个人的热忱和家国情怀,书写着新中国的新变,但这种集体颂扬,却也简化了现实社会的复杂性。1978年起,归来的诗人开始大放异彩,随着《阳关》杂志“新边塞诗”专栏的开辟,诗人们以祁连山、河西走廊为空间载体,探索历史与生存更深层次的问题。1990年代,以老乡为代表的诗人群体,转向对微观生活的诗性发现,实现了雷蒙德·威廉斯所谓的,地域空间与个体情感的深层链接。匡文留的西部女性诗,关注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与生存状态,在“新边塞诗派”中高扬起女性意识的大旗。新世纪以来,张子选、高凯、彭金山、古马、阿信、叶舟、娜夜、人邻、唐欣、徐兆寿、阳飏、桑子、完玛央金、王若冰、包包、雪潇、倪长录等诗人,更以其诗作将甘肃地域书写引向一个更为开放的空间。他们突破了地域边界的桎梏,也不再囿于对地域的单向固守,开始直面现代性语境下的文化认同、生态焦虑等人类共通的命题,将地域书写从对一方水土的具象描摹,升华为探寻人类生命本质的生命书写。

2 新世纪空间诗学的多重路径

当代诗坛的地域书写常面临同质化符号堆砌、猎奇式奇观呈现及感情空泛等问题。由于地处偏远,相对而言,甘肃诗人较少受浮躁世风的侵扰。正如彭岚嘉所言:“这些诗人的诗歌创作,以一种更为开阔的视野观照人类存在的诸个方面,对文明进程的反思,对天道人性的追问,对历史余绪的思虑,对内心世界的琢磨,对世俗人生的关注,对道德困境的省察,对生存本相的考索,对终极关怀的忧思……个人创作的多向度,使我们很难归纳总结他们的创作特点,但至少在两点上他们具有共通性:其一是坚守地域性写作。”^[2]当经济文化重心转移,社会现代化持续推进,相对滞缓的发展节奏,反而淬炼出当代诗人对文明的深度凝视。

乡土诗的书写,常存在杨光祖所批判的典型困境:“一种是理想的乌托邦式写作……另一种是丑化写作或者妖魔化写作……不论是美化书写,还是丑化或妖魔化书写,其实都是缺乏自信的表征,是‘瞒和骗的文艺’。”^[3]这种缺乏自信所致的逃避心理,恰如笛卡尔(René Descartes, 1596—1650)所说:“如果这个形象显得非常陌生和非常可怕……这就会在灵魂中激起一种恐惧的激情,并且之后使人或者变得勇敢,或者变得害怕和忧虑起来……取决于我们身体禀赋的不同或灵魂力量的差异。”^[4]这种害怕和忧虑,往往让诗人无法直面现实,使诗情难以真实地呈现,以至趋于伪装或变形。甘肃诗人的乡土诗书写恰恰突破了这一点。高凯以质朴且诙谐的笔触,丰富鲜活的意象,深切的情感,生动且传神地绘制出陇东地区诗意又艰难的生命图景。《我怀念从前的那些伤疤》《谜语里的老山羊》《父亲的镰头》等诗篇,皆传递出诗人与这片土地生死

相依的浓烈之情。牛庆国的诗,既乡土,又现代。将物理空间的限制,转化为某种生命力,展现出人的求生本能自觉。林野的诗,富有画面和描摹感,读之使人如临其境,如见其人。此外,诗人还将本土方言、市井白话、乡土俚语去粗取精,既保留烟火气,又剔除粗鄙之感,让日常语言富有诗性。

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的咽喉通道,历来都备受诗人瞩目。甘肃诗人对河西的书写,以古马、叶舟、梁积林等人的创作最为突出。拙文曾指出:“河西之于古马,可谓生命和精神的双重原点。”^[5]这种“双重原点”的羁绊,正是古马能突破历史标本化书写的关键。古马对于武威和河西怀有浓厚的乡土情结,他的诗,既是诗人独特生命体验和民族记忆的回响,也是诗人远走的灵魂在错位时空中的某种回归,那种裹挟着西部风情的宗教情怀与悲悯之心,也正是他的诗作得以成功的关键所在;敦煌是叶舟书写多年的母题,他塑造出了一个神圣的、拔高的、远离地面的敦煌。他说,“只要一看见‘敦煌’二字,我甚至会有一种触电般的反应。打个比喻吧,敦煌就像一座超级发电站,一旦靠近她,我就发亮,天空和想象也会彻底打开。”^[6]梁积林的《河西大地》《梁积林的诗》《西圣地》《西北偏北》等诗集,则在目睹过、生活过、经历过的西部风物中,书写着独属于自己的诗歌地理。历史空间的激活,需以个体与地域的深度羁绊为根基,唯此,才能让历史激活于当下,不只是过往的灰。

保罗·瓦莱里(Paul Valéry, 1871—1945)十分强调诗人对情感的表现和转化:“诗的本质是一种以其引起的自发的表现力为特征的情感。但诗人的任务不能限于承受这种情感。”^[7]甘肃诗人对甘南的书写,不仅体现出草原的神性情感,更将其升华为万物平等的诗性表达。素有“小西藏”之称的甘南,多元文化与深厚的宗教底蕴,共同构筑了这片土地的精神根基。从定西转往甘南的阿信,其甘南书写,侧重于生命体验的向内挖掘,拒绝将草原简化为圣洁符号的堆砌,而以个体灵魂与地域的共鸣为核心。拙文曾说:“阿信的诗贴近生命,贴近灵魂,是一种生命体验式的写作,一种向内的探索,向灵魂深处的挖掘。”^[8]阿信诗中,甘南既是物理空间的写作对象,亦是精神空间的体验场域。生长于甘南的扎西才让,其创作更是扎根甘南,草原的辽阔、河流的蜿蜒、经幡的飘动、格桑花的绽放、长辫子的扎西吉等地域元素早已融入他的生命体验,成为其诗歌的血肉。相较之下,从甘南走向兰州的刚杰·索木东,其甘南书写,更多地是远走他乡多年以后,某种含泪的回望。此外,完玛央金的《雪域女儿》突破了女性等同于草原装饰的性别刻板印象,桑子的《甘南牧歌》则审视了神性与现代性的共生问题。

以唐欣、阳飏、人邻为核心的兰州城市书写,既拓开了甘肃地域书写的城市维度,也修正了城市诗歌的偏向。当大多数

城市诗歌或沉迷于钢筋水泥的现代性焦虑，或陷入乡愁怀旧的逃离叙事时，唐欣以口语化的语言，将黄河啤酒、牛肉面等日常元素转化为城市情感的载体，其“不刻意赶潮”^[9]的话语方式，让兰州从地理枢纽变为人的生活现场。一首《我在兰州三年》，道尽了多少人心目中的兰州。阳飏生于北京长于兰州，他的诗，常常将兰州的地域特色与深厚的历史文化相结合，其《兰州：生长之城》一诗，又将兰州的地域性与童年阵痛相互编织。人邻则以细腻的笔触，捕捉黄河边老茶馆的烟火气，拒绝将城市简化为冰冷的工业符号。相较而言，满族诗人娜夜的地域书写则呈现出流动的特质。她一路从辽宁迁至西北，后赴南京求学，最终移居重庆。历经东北的冷峻、西北的辽阔、南方的温婉潮湿，这种体验，也使她的语言既带有斩钉截铁的力道，又与女性的敏感、细腻相融合。地域的辽阔，在她的诗中被转化为隐透着自由与穿透力的精神空间，赋予了其地域书写独特的诗性，也为性别化空间的建构，提供了女性视角的补充。

通过空间诗学的建构，甘肃诗歌克服了地域书写中普遍存在的同质化、猎奇化以及空泛化等问题。从黄土高原至兰州河谷，从河西走廊到甘南高地，他们始终将深厚的情感融入其中，诗意地栖居在陇原大地上，并留下了无数动人的诗篇。他们的书写，将地域性符号升华至人类生存的普遍议题，赋予了西部诗歌独特的民族特色和多元的观察视角，也展现出了地域书写强大的生命力和精神深度。

3 价值与反思：理论解构与代际突破

中国地域诗学的建构中，甘肃当代诗歌的地域书写，既实现了地方经验的普遍化转化，又实现了多民族族际空间的共生性建构。诗人将本土经验，视作揭示普遍人性之门径。高凯的乡愁、古马的精神原点、阿信的万物平等观等，都将地域符号转化为人如何与土地、历史、自然相处的普遍命题，以具体的地方感知叩问人类共通的生存困境。此外，甘肃诗歌的地域书写，也突破了单一民族视角的局限，形成多民族空间经验共生的形态，通过诗性转化，多民族经验也生成了新的文化认知场域。这种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族际空间建构，区别于全国多民族诗歌中常见的符号展览式书写，呈现出费孝通所追求的“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”^[10]的文化自觉。

然而，问题也深植其中。部分诗人对河西、甘南的书写，依然陷入了列斐伏尔（Henri Lefebvre, 1901—1991）所批判的“空间异化”^[11]困境。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中，地域空间愈发从承载情感与记忆的象征性空间降格为空间的表征，即某种被消费的文化符号。这类诗人，将河西简化为沙漠骆驼或大漠狐烟加胡姬的异域想象，将甘南定格为经幡、牦牛、雪山、草原的静态画面，刻意回避地域特色的复杂性、工业化与传统社会的冲突、阿信所体验到的孤独与痛苦和古马感知到的生命疼痛等，仅以美化或满足他人猎奇心理的方式，掩盖对地域的真实

感知。

也有不少乡土诗，普遍存在性别化空间缺失的问题。乡土诗的书写，往往以父亲的犁和祖父的土地为核心，地域被建构为男性的劳作场域，而女性在地域空间中多为灶台边的母亲或等待的妻子、女儿等形象，成为静态的背景符号，忽略了女性力量。女性虽是地域书写的参与者，却也是地域叙事的被遮蔽者。甚至于，部分男性诗人的乡愁，他们所眷恋的那个故乡的惬意与诗情，都是以母亲或妻子形象的牺牲为前提和底色，母亲的辛劳、妻子的隐忍成为乡愁美感的注脚，这一现象正是南茜·弗雷泽（Nancy Fraser, 1947—）“承认正义”理论的现实映照。在地域叙事中，女性缺乏文化承认，主体性被消解为男性情感表达的工具。尽管娜夜、完玛央金等女性诗人尝试以女性视角重构地域空间，但女性诗人数量有限，且尚未形成群体性力量，以致地域书写的性别维度仍不完整。

另有一些诗人，惯于使用地域符号加抒情的固定套路：写河西必过玉门关，写甘南必赞扬雪山，写陇东必感叹黄土。这种书写，仍停留在罗曼·英伽登（Roman Ingarden, 1893—1970）所说的“文学作品的外在层次”^[12]，停留在表层意象的堆砌，而未能触及地域与个体灵魂真正的情感流动。地域空间，实则沦为标签化的背景。其根源在于诗学思维的惰性，诗人满足于安全符号的表达和惯常思维的书写，不愿走出语言的舒适区，深入挖掘地域的新经验，只能陷于自我重复或重复他人。

好在，90后诗人的地域书写，已呈现出齐格蒙特·鲍曼（Zygmunt Bauman, 1925—2017）所说的“流动现代性”的特质。通过高考走出大山，独面社会的年轻诗人们，在适应飞速发展的城市生活的过程中，重构了传统的地域认同。他们拒绝乡村与城市、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，直面地域的流动性与复杂性，为甘肃诗歌突破困境提供了新路径。庄苓的《从古中国出发》将天水老井与兰州地铁并置，书写着城市化进程中的故土记忆。老井与地铁的对话，展现出年轻一代对地域认同的复杂思考，对传统乡愁怀旧式抒情方式的突破；赵琳的《白马藏银》，在故乡银饰与都市霓虹的对照中，探索民族文化活态传承的可能；文周的《女人》《父亲》《嫁娶》等作品，则深刻呈现出现代化进程年轻一代的精神创伤，以及被时代所割裂的故土的生存困境和人性的悖论。这些书写以流动现代性的视角，回应城乡流动中的时空错位、精神的成长与撕扯、灵魂的出口及回归、对故乡的反观及自省等命题，使地域书写成为回应现代性焦虑的支点，而非逃避现代性的港湾。

从闻捷、李季以真挚之情描绘河西走廊的自然与人文风貌，到老乡、姚学礼将地域特征与个人情感紧密联系，再到古马、阿信等利用空间诗学构建跨民族的诗性空间，甘肃的诗人们始终以赤子之心，使地域成为情感承载、激活历史及民族联结的精神场域。尽管目前仍存在地域符号的异化、女性经验的

遮蔽等问题,但新一代诗人已通过流动现代性的书写,为重构新乡愁的探索指明了方向。这种诗意地栖居在陇原大地,并植根于陇原大地的诗歌书写,不仅未陷入当代地域诗歌同质化的藩篱,为多民族文学的和谐共存提供了实践案例,更以其从地

方到人类的追求,为中国当代地域诗学的建构注入了深刻力量,持续展现了地域诗歌在连接传统与现代、探索人类生存本质方面的独特价值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袁行霈.中国文学史(第二卷)[M].高等教育出版社,2005年版,第202页.
- [2] 彭岚嘉.甘肃诗人群体的格局与姿态[J].当代文坛,2003,(06):89-91.
- [3] 杨光祖.甘肃诗坛:多元文化下的众声喧哗,西部文学论稿,山西人民出版社[M].2004年版,第25页.
- [4] [法]勒内·笛卡尔:《论灵魂的激情》,贾江鸿译,第30页.
- [5] 周文艳,杨光祖.一马出了西凉界——古马诗集《河西长歌》研讨会综述[J].西部文艺研究,2024(5):91-95.
- [6] 叶舟.叶舟携长篇力作《敦煌本纪》来宁》.南京日报[N].2019.8.19.
- [7] [法]保罗·瓦莱里:文艺杂谈,段映虹译,第387页.
- [8] 周文艳.只有雪粒划破空气的声音——阿信诗歌简论[J].甘肃高师学报,2020,25(01):135-138.
- [9] 彭金山.各美其美,蔚成大观——新时期以来甘肃诗坛概览[J].西北师大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05,(03):42-46.
- [10] 费孝通:论文化自觉,费孝通文集第14卷,群言出版社[M].1999年版,第194页.
- [11] [法]亨利·列斐伏尔:空间的生产,刘怀玉译,商务印书馆,2021年版,第305页.
- [12] [波]罗曼·英伽登:文学的艺术作品,张廷国译,中国城市出版社[M].2002年版,第68页.